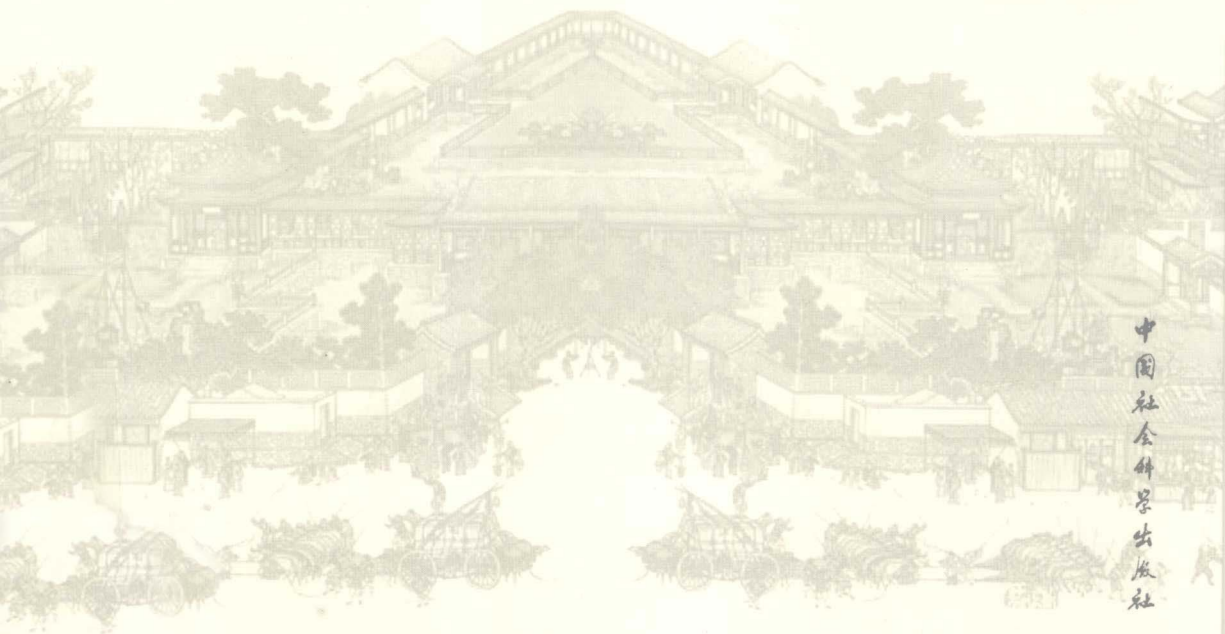


薛
泉
◎
著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 与文风演化

MING ZHONGHOUQI WENXUE LIUPAI
YU WENFENG YAN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薛
泉
◎
著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 与文风演化

MING ZHONGHOUQI WENXUE LIUPAI
YU WENFENG YAN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 薛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765 - 1

I. ①明… II. ①薛… III. ①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0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张 林
责任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与世间很多事情一样，学术研究欲取得大的成功，也需要日积月累，步步为营，由点及面，循序渐进。这其间讲究的是一个坚持、延续和拓展。没有坚持，便无法延续；没有延续，就难以拓展。薛泉君的学术经历是一个例证。他早年由东鲁至燕赵师从詹福瑞、刘崇德教授读硕读博，研究题目分别是《两晋拟古诗初探》、《宋人词选研究》，打下了中古文学和宋代文学的底子；其后进入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视野由前向后继续延伸，选择了《李东阳评传》、《李东阳研究》两个题目，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又奠定了明代文史的基础。如今，他转赴海南，以李东阳和茶陵诗派为支点，进一步拓展领域，对明代中后期几大文学流派作系统考察，于是便有了这部《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书稿。

该书主要以明代中后期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几大重要文学流派为参照重心，在明代文化复古的大背景下，梳理、探析明代中后期主流文风的演变规律及其意蕴。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四：

其一，对涉及到的每个文学流派，多从流派称谓来源、成员构成、学术渊源等方面，进行较详细的爬梳、考辨，特别是清理了七子派、竟陵派、云间派一些尚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其二，以各流派核心文学理论为中心，考察明代中后期主流文风的演变。其间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同一流派内部形成的群体效应及其对一时文风的主导作用，二是不同流派间通过论争而对文风发展演变的推动；三是前一流派对后起流派形成理论导向，使得相似文风在不同时段的传承中得以复现或新变。

其三，新旧文学流派的交替存在若干规律：当一个流派走向末路时，

2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多流于雷同剽窃，遭人唾弃，这就为新流派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而旧流派内部某些成员意识到本派弊病，开始进行调整、修补其理论，又往往成为后起文学流派的理论始点。

其四，明中后期文学流派的兴废，也是一个主流文风不断转向、演变的过程。自茶陵派始，明代主流文学总体上走过一个“复古——革新——复古”的历程。若仅就其中前后两大复古思潮而论，前一“复古”，涵盖茶陵派、七子派、唐宋派；后一“复古”，主要指竟陵派、云间派。此二“复古”并非简单的重复，前者偏重从艺术上探求诗言情、文载道之路径，后者则既重师古又重师心，其中云间派更力图将诗歌与现实人生贴近，承接了儒家的风雅传统。这一历程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推重，也存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的脱节。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薛泉君对明中后期纷纭繁杂的文学流派及其发展态势已有了相当的体察，对文风之因革嬗变及其规律也有了较为深细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由此再进一步，对若干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明确认为李东阳茶陵派为明代中后期文学复古的起点，从而改变了论者多以前七子为起点的传统看法；在探析七子派复古文学主张的成因时，指出其理论之形成，从政治层面说是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从文学层面看则是文学审美特质的寻复与文学传统的再续；谈及唐宋派，特别强调其在言情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徐渭“本色论”、公安派“性灵说”生成的影响；至于公安派，则一方面着力凸显其在晚明文风演变进程中否定复古思潮、回归文学言情本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揭示其重师心不重师古所导致的肤浅俚俗，以及后继者竟陵派因取法狭窄而深陷“深幽孤峭”的原因，由此对晚明激进文学退潮，复古文风回流的大势作出更为深入和准确的判断。

当然，关于明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论著已有很多，要想在一片久经耕耘的土地上再结硕果，既需深耕细作，也需改变视角，别出手眼。在这方面，作者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有继续开拓的空间。清人章学诚《答客问》有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是做大学问的境界，也是学人应该追求的境界。在此提及这段话，既希望薛泉君能以此部书稿为

支点，对相关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坚持不懈地探索、延续和拓展，获取新的成就，亦借以共勉。

是为序。

辛卯岁末，尚永亮匆笔于珞珈山麓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明人文学流派情结与中晚明文风的演化	(2)
二 复古文化传统与政治背景下的明代诗文	(9)
三 研究范围及主要内容	(19)
第一章 茶陵派:明中叶复古文风的开启	(22)
第一节 茶陵派与明中叶复古文风的开启	(22)
一 诗法盛唐,兼顾宋元	(22)
二 文宗欧曾,偶及秦汉	(29)
第二节 茶陵派对台阁体的因袭与超越	(35)
一 台阁体的体认	(36)
二 台阁体的改造	(42)
三 诗言情的重视	(47)
第二章 七子派:明代复古文风的鼎盛	(57)
第一节 七子派考略	(57)
一 七子称谓起源及其成员构成考	(57)
二 七子派称谓来源及成员构成考	(70)
第二节 七子派与弘正、嘉隆文风之转捩	(73)
一 七子派的崛起与弘正、嘉隆文风的转向	(73)
二 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	(88)
三 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宋无诗论	(95)

2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第三节	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文学审美特质的寻复	(101)
一	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	(101)
二	文学审美特质的寻复与文学传统的再续	(113)
第三章	唐宋派:尊唐崇宋文风的复归	(133)
第一节	唐宋派的兴起与嘉靖初诗风的演化	(133)
一	唐宋派的兴起	(133)
二	唐宋派与嘉靖初诗风的演化	(137)
第二节	唐宋派与嘉靖前期文风的演变	(143)
一	由宗法汉魏而师法唐宋	(143)
二	文以明道与法度的重申	(152)
第三节	唐顺之“本色论”及其理论价值 ——兼论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风转向之关系	(161)
一	唐顺之“本色论”及其理论价值	(161)
二	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风转向之关系	(164)
第四章	公安派:信心反古文风的倡扬	(170)
第一节	公安派兴起的学术、文学渊源	(170)
一	公安派名称来源	(170)
二	公安派的学术、文学渊源	(172)
三	公安派的兴起及文坛风尚	(176)
第二节	公安派与晚明文风之转向	(179)
一	师心与反古: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179)
二	公安派与晚明文学革新先锋之关系	(197)
第三节	由信口师心趋向信心师古	(208)
一	由信口师心趋向信心师古:文学理论的自我调纠	(208)
二	公安派文学理论自我调纠的学术氛围、政治背景	(219)
第五章	竟陵派:晚明复古文学思潮的回归	(224)
第一节	竟陵派兴起与发展	(224)
一	竟陵派诗学源流考略	(224)
二	竟陵派的形成与发展	(231)

第二节	竟陵派与晚明复古文学思潮的回归	(239)
一	信心信古求真情	(240)
二	师心师古宜雅正	(245)
第三节	竟陵派“深幽孤峭”文风成因探赜 ——兼论晚明激进文风回落、复古文风回归	(249)
一	政治、学术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所趋	(249)
二	中国古代文人传统依古意识使之然	(256)
第六章	云间派:明末复古文风之复盛	(262)
第一节	云间派形成考	(262)
一	云间派称谓来源考	(262)
二	云间派形成时限考	(267)
第二节	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	(277)
一	云间派文学复古宗崇方向: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 开元	(278)
二	云间派文学复古操作程序: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 为美	(283)
第三节	云间派文学复古与图存救亡	(291)
一	复兴古学以图存	(291)
二	倡导实学以救亡	(296)
结语	文学流派、文风演化与文学史建构	(302)
主要引用和参考书目		(307)
后记		(322)

绪 论

丹纳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①属于艺术宗派的文学流派，对文学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一个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交替更新，就是一部那一时代主流文风的发展演变史。明中后期文学^②尤其如此。所谓主流文风，主要是指当时文坛占主流地位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文宗尚与审美取向。

① [法]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5 页。

② 研究者一般将明代文学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或前、后两个时期，本书采用三分法。鉴于研究之需，首先有必要明确明中期文学发展之断限。南炳文先生认为，“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与瓦剌打了一仗，明朝皇帝英宗在土木堡作了瓦剌的俘虏。这件大事，一般将之看作明代中期的开端。万历九年（1581 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进行了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改革。这次改革，一般看作是明代中期的下限。”（南炳文、汤纲：《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5 页。）这一断限得到广泛认可，然而这是史学的分期。至于文学的分期，虽与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不过，以标志性事件为划分节点，颇有借鉴意义。关于明中期文学的分期问题，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皆谓明中期起于前七子，而将茶陵派归之于明前期文学。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将从弘治到隆庆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也同样以前七子为明中期文学之起点。（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3 页。）文学史上所以以前七子派作为明中期文学的开端，多半是因其兴起是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其实，前七子派是在李东阳茶陵派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其理论导源于茶陵派，茶陵派于其有兴起之功，可视为向前七子派过渡的桥梁，或者是过渡期。若将二者分置于两个阶段，势必割裂其内在联系，不利于整体上把握明代文学发展演化规律。关于文学分期的问题，固然要关注标志性事件及其对主流文风的影响，但其前的过渡期，也要处理得当，可视其与主要事件关系疏近，确定其归属。若与主要事件关系紧密，不妨归之于主要事件所属时期；否则，可置于主要事件之前的时期。至于跨朝代文人的归属时代，以其主要生活的时间段为参照系，具体确定其归属。本着这一原则，本书所谓明中后期，起自李东阳茶陵派，迄于陈子龙云间派；时间跨度上，从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李东阳亮相文坛，至清初陈子龙过世。

一 明人文学流派情结与中晚明文风的演化

文学流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认为,文学流派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文学流派一般是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从基本形态上看,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这种流派,从作家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政治倾向、美学观点和艺术趣味相同或相近而自觉结合起来的,具有明确的派别性。他们一般有一定的组织和结社名称,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进行论战。但这些还只有文学集团的意义,只有进而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色,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这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是自觉的文学流派。”“另一种类型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这种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或者是因某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吸引了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定核心和共同风格的派别;或者仅仅是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一定的流派名称”。^①本书所论文学流派之涵义,兼顾广义与狭义。一个文学流派的成立,应具备盟主意识、统系意识和风格意识三个条件。^②

有明一代,文人的宗派意识强烈,文学流派情结浓郁。陈衍先生指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③结社立派是明代文人标榜的重要方式之一。据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统计,明代有名称的社团多达170多个。^④明人结社风气之盛,略见一斑。尽管文学社团不见得都具文学流派性质,但“文学社团有助于流派的形成”^⑤。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2页。

②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③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④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610页。

⑤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明人之所以如此热衷结社立派，至少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诠释。

其一，讨论艺文，切磋文技之需。明代文人讨论艺文结社，可粗略分两种情况。一是以研习八股文为主，参与者多是些未考取功名的士子，主要动机在于研讨时文技法；一是侧重诗文酬唱、讨论诗文^①，入社者多为考取功名的进士，他们彼此诗文唱和，研讨诗文技艺，不失为一种雅兴。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前者并不尽是讨论八股文，如袁宏道年轻时在公安城南组建的文社，不时于举业之外，研习古诗文词。^② 后者亦有布衣参与，后七子派中就有布衣诗人谢榛。

科举制度使文人结社成风。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应士子研习八股时艺的需要，文社迅速兴盛起来。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之一云：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即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③

文社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精研时文，揣摩文风，往往在科考中形成规模效应^④，这越发激起时人结社的热情。进士及第后，他们往往在一起相互唱和，谈文论艺，结成文社。这种文社容易发展成文学流派。如李东阳，其成化年间踏入文坛，自然易受结社风气影响。《怀麓堂诗话》就多次谈到国初诗人结社的情形。这表明，他对当时文坛结社立派情况是比较

① 此处所谓文，是排除八股文的，指八股文以外的古诗文辞等。

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郎先生行状》载，袁宏道“总角，工为时义，塾师大奇之。入乡校，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时于举业外，为声歌古文词，已有集成帙矣”。（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55页。）

③ 吴应箕、吴伟业等：《东林本末》（外七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④ 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之二载：“伟业以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洎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鹪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集。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交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吴应箕、吴伟业等：《东林本末》（外七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4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关注的。事实上，他本人也参加过一些文学社团活动，并对之耿耿于怀，其有诗句可证：

社中诗友惊频换，湖上山名问不迷。兴发便须呼笔札，酒酣欹侧雁行题。^①

城市行踪嗟我在，山林性格只君知。如今旧社无新兴，不似星堂夜战时。^②

这些诗皆为李东阳翰林时所作。由诗中提到的“旧社”，见其很早即参与诗社，且尚不止一个。由“社友频换”，知其在社的时间当不短。后来，他羽翼丰满，便自立门派。何良俊有曰：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③

结社立派可以谈文论道，相互切磋文艺，李东阳茶陵派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康海与王九思、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结为文社，亦有讨论文艺之意。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云：

是时，李西涯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独不之效。乃与鄂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穀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④

前七子派也是在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结为文社、讨论文艺的基础上形

① 李东阳：《诗稿》卷之十一《西山和许廷冕、刘时雍、汪时用三兵部韵五首》其二，《李东阳集》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3页。

② 李东阳：《诗稿》卷之十五《次韵寄答若虚二首》其一，《李东阳集》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④ 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之五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6页。

成的。明中后期的许多重要文学流派，多是先结社后立派，或者文社本身就是文学流派。

其二，标榜门户，党同伐异之需。明中后期文权下移，文人贵于自立，大家意识特浓，这对立社结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夏允彝《岳起堂稿序》云：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贻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①

既然文章贵贱操之于下，文人贵于自立，那么“明人论诗，好言宗派”^②，就容易理解了。明人开宗立派，多为标榜门户，甚至以之党同伐异。全祖望《陆大行环堵集序》云：“其盟主几若齐、秦之欲自帝于东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勋’，摈排异己谓之‘屏放’，狂惑至此，播为乱气，若澜倒堤决，莫之堙塞。”^③ 陈衍先生亦有言：“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惟务其名，树职志，立门户，是丹非素，人主出奴矣。”^④ 这是对明人借文学流派标榜门户、扬名立身的尖锐批驳。其实，明人对此已有意识。前七子结社论艺引起李东阳“大诤之”，便是明证。又，李若纳《徐文长袁中郎二集序》云：

李、王操戈，遂得中郎攻盾。中郎近攻，又遂得后来反噬，相报无已，几令词场为冤业。从古文文章之变有之，庸渠醉酤虐云尔哉……明之多变而好讥，无乃文章劫厄为之乎？且士有士党，文有文党，相讥之习，自古已然，特以并时相讥，矜露所长耳。至于弹射槁枿之

① 陈子龙：《陈子龙诗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0页。

②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6页。

④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6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中，扫灭口珠之后，一变即横一讥，一讥因成一变，惟明始然，而至近日尤烈。^①

文学流派即为“文党”之一种。“并时相讥，矜露所长”，即是“文党”标立门户、党同伐异的具体表现。范景文《葛震甫诗叙》亦云：

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摘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囂，莫辨谁是。^②

以上诸家对明人文学流派林立、流派之争，皆深恶痛绝。但从文学发展角度来说，文学流派只有相互论争，才能发展。“一变即横一讥，一讥因成一变”，就是文学发展演化的外现。可见，文学流派“摈排异己”、“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并时相讥”，不见得是“播为乱气”；“莫辨谁是”、“而门径多岐”，也并非一无是处。由这些否定言语，可捕捉到一些珍贵的信息，以资文学研究：其一，文学流派的兴废更替，是文风演化、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这一过程时常伴随着矫枉过正。其二，明代文学流派论争与交替，多围绕着拟古、造新展开。事实确然，《明史·文苑传一》云：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

① 李若讷：《四品稿》卷之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② 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卷六，《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99页。

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①

这段话清理了明代文学发展演化的脉络，其中主要的节点，实已牵及到明中后期先后兴替的主要文学流派：茶陵派、前七子派、唐宋派、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慎中、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辈、袁宏道、钟惺、陈子龙等“各争鸣一时”，皆为文风转捩之关键，这也更凸显了文学流派盟主的重要作用。宋荦亦深有感触，《漫堂说诗》云：“成、宏间李东阳雄张坛坫；迨李梦阳出，而诗学大振，何景明和之，边贡、徐祯卿羽翼之，亦称四杰，又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称七子；正、嘉间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变其体；嘉、隆间李攀龙出，王世贞和之，吴国伦、徐中行、宗臣、谢榛、梁有誉羽翼之，称后七子；此后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② 鲁九皋则更为详尽地指出文学流派在文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诗学源流考》有曰：

永乐以还，崇尚台阁，迄化、治之间，茶陵李东阳出而振之，俗尚一变。但其新乐府，于铁崖之外，又出一格，虽若奇创，终非正轨。嗣是空同李氏、大复何氏大声一呼，海内响应，又得徐昌穀祯卿、边华泉贡为之辅翼，称弘治四杰。继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为七子，是为“前七子”。是时诗学之盛，几几比于开元、天宝，而李、何声价，当时亦不啻李、杜。七子之后，则有祥符高子业叔嗣，以深微妙婉之思，发温柔敦厚之旨，粹然一出于正。继之以皇甫子浚冲、子安淳、子循沆、子约濂兄弟，并溯源于建安及潘、左、鲍、谢诸家，不失五言正音。此外如薛君采蕙、华鸿山察、杨梦山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7308页。

② 丁福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巍，虽才力或减数子，时有出入，亦其次也。嘉靖之初，李、何之风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鳞氏复扬其余烬，与四溟山人谢榛及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结社为“后七子”，以振兴风雅为己任……前后七子，议论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后书则置焉。其见非不甚善，特斤斤规仿，过于局促，神理不存。王、李之视李、何，抑又甚焉，故钱牧斋《历朝诗选》极力摈之。然而当诗教榛芜之日，其催陷廓清之功，亦何可少……自是以后，诗学日坏。隆、万之际，公安袁氏，继以竟陵钟氏、谭氏，《诗归》一出，海内翕然宗之，而三汉、六朝、四唐之风荡然矣。其间非无卓然不惑，如归季思子慕、高景逸攀龙、李伯远应徵、区海目大相、谢在杭肇瀚、曹能始学佺诸君子者，力持风气，然淫哇之教，浸人心术，论诗之害，未有烈于斯时者也。及陈卧子子龙奋臂大呼，少一转变，论者犹以其不离“七子”面目为憾。然大雅举止，与侏儒之拜舞何如也？^①

综合上述意见，明中后期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导致几次文风大转向：弘、正时，茶陵派“出入宋元，溯流唐代”，开启明中叶文学复古先河；前七子派倡言“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嘉靖初年，唐宋派诗仿初唐，文宗欧、曾。嘉靖中期，后七子派重张前七子大旗，重申文主秦、汉，诗规盛唐。隆庆、万历之际，公安派、竟陵派登上文坛，力扫七子复古之风，“三汉、六朝、四唐之风荡然”。至陈子龙云间派出，“撷东汉之芳华”，推崇前后七子，文风又为之一变。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这些文学流派兴废，并非皆前后衔接。如唐宋派兴起于嘉靖初年，虽早于后七子派，但尚与后七子派共存一段时间。再说，一个文学流派内部成员的文风，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流派主导文风亦非前后整齐划一、一成不变。

大体上说，明人的文学流派情结，是明代文学发展演化的重要推动力。明代文人“好言宗派”，推动着明代主流文学不断发展、演化，致使明中后期文学热闹非凡，特色鲜明。不过，明人好言宗派多是统摄于明代复古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范景文“拟古造新”之论，已初露端倪。

^①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7—1359页。